

《水草长生》:独自签收四季

正在上映的电影《水草长生》,将镜头对准南方的一片土地,和一个两次丢失耕牛的少年。影片不提供逆袭的热血,只呈现一场沉默的寻找。这寻找,关乎一头牛,更关乎那颗无处安放的、渴望“归属”的心。



□于晓风 孟煜嘉

心骋“八荒之野”

影像的诗学,始于一道刺穿尘埃的光束,落于南方乡村教室斑驳的讲台。少年广猪仔立于光中,以土地般朴拙的乡音,诵读自己笔下的诗行。诗句里淌着对未曾谋面的母亲的想象,浸着对稻穗与溪流的稚嫩礼赞。语文老师听出了那字句间野生草木般的灵气,给予了某种木讷的、近乎惶惑的肯定。然而,这微弱的知音之火,旋即被同龄人轰然的嗤笑所淹没。那笑声是锋利的犁铧,瞬间犁过他刚刚试图敞开的胸膛。他转身逃出,将一个灵魂的颤栗,永久地烙印在身后那片巨大而空洞的喧哗里。他那与生俱来的、露水般清澈的感知力,在崇尚标准答案的空气里,成了一个需要被矫正的误差。

《水草长生》于此,为我们显影了影片表现的第一重困局:个体灵韵与系统规约的永恒抵牾。片中那间哄笑的教室,其回音远

远超越了校园,在各种关系的“方寸”角色里,人与关系中那个本应鲜活、完整、自由驰骋的“自我”及“他者”失去了联结。发现这一困境,即是意识到:我们痛苦的根源,或许不在于缺乏爱,缺乏事业或缺乏伴侣,而在于所有这些关系,都未能安顿我们那颗渴望在真实、自由与深刻共鸣的“八荒之野”上栖居的心。

“缺席”与“充盈”

当广猪仔转身背对教室的喧哗,他迈入的是一个更古老而深厚的秩序——土地的时序。电影中,当同龄人欢腾地拆解来自远方的包裹,他却双手空悬。然而,镜头意味深长地揭示:他虽未曾收到那份来自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的慰藉,却在家乡的原野上,独自签收了天地馈赠的完整四季。他签收春天秧苗的初绿,签收夏日骤雨的激越,签收秋夜稻穗低垂的谦恭,签收冬日土地的静默沉思。这份签收,是灵魂与自然缔结的私密契约,是将衡量存在的尺度,从“他者的给予”,悄然内转

为“自身的感受”

《水草长生》于此完成了一次优雅的价值重估:它将“缺席”转化为“充盈”的契机。外部联结的稀薄,反而促使他与更本质的世界,也即脚下的土地,建立直接而丰沛的对话。这并非消极的妥协,而是生命主体性的昂然确立:我之存在价值,不由远方寄来的包裹定义,而由我与脚下土地每一次呼吸的共振来确认。

因此,真正的破局,是一种深刻的认知转向。它始于坦然接受“快递可能永不到来”的真相,而后惊喜地发现:我们自己,本就拥有一片星辰流转、生生不息的无垠原野。这,便是“允许一切发生”后所绽放的温柔而坚定的力量。

“失去”与“毁灭”

《水草长生》最深刻的力量,蕴藏在两次相似的“失去”与一场彻底的“毁灭”之中。八岁那年,耕牛走失,广猪仔无助地山野上回荡。十年后,牛再次走失。这一次,十八岁的他沉默地系紧草鞋,目光如犁铧般破开晨雾,走向寻

牛之路。两度失牛,划出一道生命成长的刻痕:从被动承受失去的孩童,成长为主动肩负命运的耕者。

然而,命运给出了更严酷的考题。当他将爷爷留下的土地耕耘得稻浪起伏,一场洪水吞噬了一切。浑浊的浪涛卷走的不仅是庄稼,更是十年光阴凝聚的希望。他站在泥泞中,面对一片洪荒般的寂静。此刻,影片抛出了终极诘问:当耕耘可能颗粒无收,坚守的意义何在?

答案,在退潮后悄然浮现。最先钻出淤泥的,是青青水草。久无音讯的父母从城市归来,没有煽情的言语,他们只是卷起沾满泥土的裤腿,走下田地,与儿子一同将新秧插入尚带伤痕的泥土。这一躬身,完成了三重“回归”:个体对土地的回归,游子对故乡的回归,生命对循环本身的回归。耕种不再仅为收获,更是在无常中确认存在、在破碎处修复连结的庄严仪式。

水草长生的秘密

因此,《水草长生》讲述的回归,绝非退回过往的田园幻梦。它是一种清醒的选择:明知牛会走失,洪水会来临,依然选择将根须深扎于此,以谦卑而坚韧的劳作,一次次从失去中重建生活。这“牛走”与“人归”之间,“洪水”与“复耕”之际,流淌的正是水草长生的秘密——在无常的循环里,活出一心一意的笃定,让生命在伤痕处,长出新的丰盈。

《水草长生》的落幕,并非一个故事的终结,而是一道照亮现实的精神光芒。它启示我们,真正的出路不在于逃离,而在于深植。当我们困于关系的方寸、意义的迷雾时,这部电影温柔而坚定地指出,真正的自由恰是在认清局限后依然选择热爱,是在经历破碎后依然相信完整。当洪水终会来临,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中那冲不走、淹不死的青青水草,成为我们内心的定力与深耕的勇气。

(于晓风为山东大学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、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,孟煜嘉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)

传承文化,尤其不要忘了文化的精神

□李康宁

日前,中华书局发布声明,回应了读者对其出版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中指出的错误,并主动下架召回有问题的图书版本。他们表示,感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和关爱,对于讹误“深感惭愧”。此前,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就其国学典藏版《西厢记》中的错漏进行致歉,并全面下架该书。

虽然有错在先,但两家出版机构的诚恳态度赢得了认可。编读之间的良性互动,对出版质量必将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,也造就了当下文化场域中“一字之师”的佳话。见贤思齐,闻过则喜,不被情绪与立场裹挟的讨论,既能

很快达成共识,也保持了双方的风度。

“人恒过,然后能改;困于心,衡于虑,而后作”,我们的传统文化中,并不刻意回避错误,更注重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,达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境界。虚心接受批评向来被视作一种“雅量”;而从批评中得到提升,更能成为一种“美谈”。管窥臆册,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比如北宋文坛领袖人物范仲淹,在桐庐为官时曾经写过一篇《严先生祠堂记》,其中有句子为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德,山高水长”。文友李泰伯看了后,建议将“德”改为“风”,境界上更为旷达。范仲淹先是“握手扣之”,而

后“殆欲下拜”。而名气并不响亮的李泰伯,就这样成了一代文宗的“一字之师”。

优秀传统文化,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珍藏。但其丰赡华美并非浑然天成,更得益于代代学人跬步不息地积累创造。面对学问,古人常常采取审慎的态度,以皓首穷经的严谨心态来治学。正是因为有着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追求,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的执念,唐诗才能拥有气象万千的恢弘境界。若是在传承中失去了这种认真的精神,不自觉地降低标准甚至潦草应对,那从本质上就失掉了传承的意义。如果连“抄书”都不认真,又谈何涵泳发扬?

诚然,时代节奏在变化,技术手段在更迭,曾经被一代代读书人所重视的书斋案头功夫,正在被逐渐忽视。借助勘校软件,可以让艰苦的审读把关工作变得简单高效;不断革新突破的人工智能技术,甚至会有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创造。但这一切客观条件的发展,都只是能手段而非目的,并不能因此淡化了“人”的主观价值判断。毕竟,文化传承者实际上也是参与者,是立足于当下时代,为未来举火照明的人。

创立于1912年元旦的中华书局,自开办时就有着革故鼎新的锐气。以“开启民智”为宗旨,中华书局从出版教科书出发,汇聚了

梁启超、马君武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茅盾等大师们的星斗之光,对传承文化作出了尤为卓越的贡献。这一次小小的跌宕,从长远看不失为读者对这个百年品牌的一次鼓励与期待,毕竟美言好听得“诤友”难得。

“士之致远者,当先器识而后才艺”。传承文化不止于名章佳句浮光掠影,那种“为天地立心”的责任感,以及惕厉自省、慎终如始的文化精神,永远不可或缺。

观文周刊主办:
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